



中国
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
系列研究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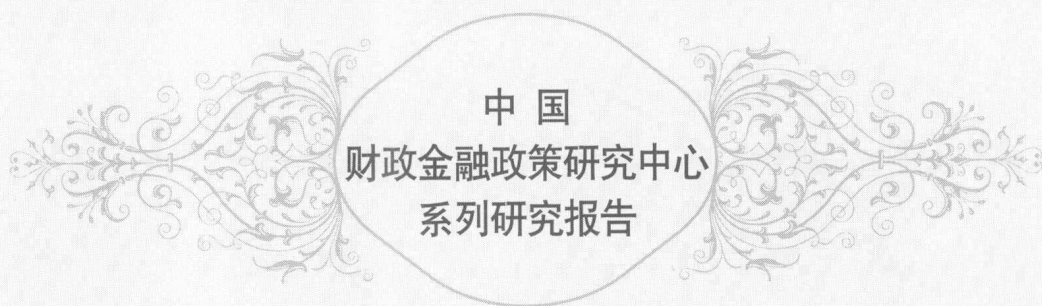


转轨中的制度与经济增长

基于微观企业的视角

马光荣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转轨中的制度与经济增长

基于微观企业的视角

马光荣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轨中的制度与经济增长：基于微观企业的视角/马光荣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2

(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系列研究报告)

ISBN 978-7-300-22335-3

I. ①转… II. ①马… III. ①转型经济-经济制度-作用-经济增长-研究-中国②转型经济-经济制度-作用-企业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12②F2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6505 号

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系列研究报告

转轨中的制度与经济增长——基于微观企业的视角

马光荣 著

Zhuangui zhong de Zhidu yu Jingji-Zengzha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2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张 15 插页 1

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80 000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系列研究报告

主 编：陈雨露 郭庆旺

学术顾问：黄 达 陈 共 周升业 安体富

学术委员：（按姓氏拼音）

陈雨露（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

丛树海（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邓力平（国家会计学院院长、教授）

龚六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郭庆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教授）

贾 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刘锡良（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助理、教授）

李俊生（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教授）

马国强（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教授）

乔宝云（世界银行经济学家）

瞿 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宋逢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王广谦（中央财经大学校长、教授）

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汪昌云（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张 杰（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

张 馨（厦门大学教授）



总 序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 1999 年，并于 2000 年经过评审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也是全国高校中第一个财政金融领域的重点研究基地。四年来，在黄达、陈共、王传纶等老一辈财政金融学家的带领下，中心以其创新的科研体制，良好的研究环境吸引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他们以开阔的视野和前瞻性的眼光，紧抓时间脉搏，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深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

理论总是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而产生，进而指导和推动实践的发展。在世界各国经济高度发展、科学技术飞速创新的时代里，财政金融理论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全球化成为财政金融理论研究的基本视角。20 世纪的后 20 年中，经济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世界各国的经济高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球化的环境中，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和新的问题，单纯的国内视角已经无法解释，更不用说为实践活动

提供有效、科学的指导。因此，对任何问题的研究都要放在全球化的框架中进行。例如，过去学者们在探讨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时，多是从脆弱的国内经济基本面和政府不负责任的政策着眼。但对于 90 年代以来频频爆发的金融危机，这些传统的理论显然已经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结论。甚至连财政政策这个一向被认为是“纯国内范畴”的问题，也面临着挑战。就税收工具而言，传统上，一国宏观税负确定，主要依据是本国经济增长的现状和目标，在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决策过程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既要遵守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还要考虑其他国家经济形势的变化。随着我国加入 WTO，财政理论的更新和政策机制的改进迫在眉睫。于是，以全球化为背景，解释和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就成为新世纪对理论工作者们的必然要求。

其次，改进研究方法和注重学术规范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倾向。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进入直接融资高速发展的时期，金融市场的空前繁荣和金融创新的层出不穷推动了微观金融理论的蓬勃发展。与传统的宏观金融理论相比，微观金融研究更加侧重于定量分析，现代信息技术和数学、物理学模型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财政理论领域也突破了原有研究方法的欠缺，政治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思想以及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模型越来越多地融入到研究工作中。相比之下，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还十分单调，基本上还停留在逻辑分析的阶段，数理统计等国际流行的分析工具在我国的经济学研究中还运用不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国的理论工作者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正在努力实现方法论的国际对接，以推动国内财政金融理论研究的突破。

第三，在实践的推动下，财政金融理论研究的对象迅速拓展。过去，囿于传统观念和我国经济发展程度所限，金融研究局限在货币政

策等宏观层面，微观仅限于商业银行。财政研究也只集中在财政税收政策和国债等宏观领域，研究对象十分单一。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我国的市场规模从小到大，宏观管理水平由低到高，财政与金融学科也不断完善。在金融领域，资本市场、衍生金融产品、金融风险管理、风险投资等领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兴趣，理论体系已经涵盖了从宏观金融运行到微观金融实践的各个方面。财政研究也更加务实，范畴扩展到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设施的管理和税收筹划等崭新的领域。财政和金融的交叉研究也日益兴起。例如货币同盟中的财政政策以及通货膨胀和税收的关系。学科体系的日臻完整和成熟，极大地促进了宏观管理层和微观主体决策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

为了推动我国财政金融理论研究的长足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积极为国内学者开创国际学术交流的空间，从每年一度的“中国金融国际论坛”到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研讨班，从罗伯特·蒙代尔、罗伯特·巴罗、本杰明·弗里德曼、让·雅克·拉丰、哈维·罗森、罗伯特·希勒等国际顶级经济学家的讲座到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主席列昂·梅拉梅德先生、德国财政部常务副部长考克·维瑟博士等业界和政界领导人的面对面，在中西方文化的一次次交汇中，中心专家敏锐地把握了理论发展的国际动态和最新趋向，结合全球化条件下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取得了理论研究的硕果。

我们现在看到的研究报告系列正是集合了中心专家研究成果的精髓，内容涵盖了财政货币政策、农村金融改革、风险投资、财政管理与经济发展、公共财政框架的设计、商业银行治理结构、资本市场开放等诸多重大现实问题，相信可以推动契合我国特点的现代财政金融理论发展，并促进国内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在中心 2003 年度研究报告系列问世之际，我们要感谢教育部和学校领导的关心，感谢各位专家的辛勤耕耘，他们的努力赋予中心以勃勃的生机。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处于新世纪全面经济复兴进程中的中国，财政金融理论研究必将随之而腾飞于世界。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

2003 年 6 月



前 言



自 1978 年以来，以市场化改革为方向的经济转轨给中国带来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经济转轨作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体制改革，是一系列大规模的、断裂性的制度变迁。以诺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如果从宏观上制度推动了 GDP 增长，那么在微观层面，制度必然影响了微观企业行为并使企业绩效得以改善。

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主要来自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从微观企业看，一个国家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技术进步带来的内部微观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即生产要素由生产率低的企业流向生产率高的企业。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也是由微观企业绩效提高和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构成的，由市场化转型所带来的制度变迁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本书主要基于企业视角的理论推演和实证研究，考察市场化转型

中的制度变迁过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揭示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微观机制。本书还关注了中国在转轨期具有的非正式制度和独特的政府分权体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且揭示了经济转轨期间政府分权体制、正式制度变迁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机制。具体而言，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

第一，本书利用中国市场化转型这一制度变迁过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考察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宏观层面，度量市场化转型中制度变迁的进程需要全面、系统的衡量指标，本书利用中国各省区市场化指数核算了制度变迁对中国 GDP 增长和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从微观层面，本书论证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两个重要机制：一是制度可以通过激励机制的改善提高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研发投入、技术引进和分工深化等，从而提高企业微观生产率；二是制度可以改善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使投入要素更多地配置到高生产率的企业，减少资源误置现象。本书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验证了这些机制。

第二，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是资源在企业间重新优化配置的一个重要途径，本书研究了金融体制发展对企业退出和资源重置的作用。通过生产率低的企业不断退出市场和生产率高的企业不断进入市场，资源得以重新配置，整个经济的总体生产率会得以提升，这也构成了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毁灭”过程。金融体制扭曲和落后会使高生产率的企业因融资约束而被迫退出市场，低生产率企业却能得到低利息的贷款而继续经营。既有文献大多强调企业层面的融资约束对企业退出的影响，但没有认识到国家或地区层面的金融体制发展对不同生产率的企业的退出会产生异质性影响，并进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本书从理论和实证上表明，金融体制发展加速了低生产率企业的退出并且降低了高生产率企业的退出概率，从而促使企业退出过程更加符合

效率原则，因此减少了资源误置现象。

第三，基于企业视角的研究，本书回答了在经济转型时期正式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绩效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作为处在制度转型期的国家，中国的正式法治体系仍不够健全，正规金融体制发展仍较为滞后，但是以社会资本为载体的民间金融作为非正式制度可以部分弥补正式法治和正规金融的不足，并且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本书从理论和实证上验证了社会资本对民间金融，继而对民营企业创立、融资和发展的作用，从而验证了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微观机制。这一研究也揭示了转型时期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间的互动机制，非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替代作用，从而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

第四，本书以国有企业隶属权下放为例考察了中国式政府分权体制的作用。很多研究指出，政府分权体制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本书关注中国转轨期间一个突出而独特的制度变化——国有企业隶属权的下放。国有企业下放是高层级政府将管理国有企业这项职能下放给低层级政府，因此本质上是一种政府组织结构转变的分权化改革，这可以充分利用分权体制下低层级政府在处理信息与促进激励两方面上的优势，从而推动了国有企业的绩效改善和进一步民营化改革。本书利用国有企业下放这样一个分权化改革的自然实验，通过对下放动因和后果的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为转型时期政府分权体制的作用提供了更为微观的证据。这一研究也揭示了，中国式的政府分权体制是正式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本书是中央在京高校重大成果转化项目“京津冀协同一体化发展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此书的出版得到该项目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马光荣



目 录



第 1 章 导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主题	3
1.3 潜在贡献	6
1.4 基本思路和技术路线	8
1.5 本书结构安排	10
第 2 章 制度对企业绩效与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综述	11
2.1 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基于国别宏观数据的研究	11
2.2 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基于转型国家宏观数据 的研究	16
2.3 制度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	20
2.4 评论与小结	24
第 3 章 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来自中国市场化转型的证据	27
3.1 引言	27
3.2 模型和数据	29

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6
3.4	小结	41
第4章 制度在微观企业层面的表现		
	——中国企业经营环境的差异与变迁	44
4.1	引言	44
4.2	文献回顾	47
4.3	数据描述	48
4.4	企业经营环境差异的来源	52
4.5	分省企业经营环境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	58
4.6	小结	64
第5章 经济转轨中制度改善对企业生产率和资源配置的作用		
5.1	引言	68
5.2	计量模型设定	72
5.3	数据和变量	74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79
5.5	小结	90
第6章 金融体制发展、企业退出与资源重置		
6.1	引言	92
6.2	制度背景与文献回顾	94
6.3	金融契约效率对企业退出行为影响的理论模型	98
6.4	数据和变量	104
6.5	实证结果与分析	111
6.6	小结	129
第7章 社会资本、民间金融与创业		
	——非正式制度的作用	131
7.1	引言	131

7.2 理论框架与模型	134
7.3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138
7.4 基本实证结果	141
7.5 进一步的讨论	148
7.6 小结	154
第8章 国有企业隶属权下放与分权化体制改革	156
8.1 引言	156
8.2 中国国有企业隶属关系演变的背景	160
8.3 理论框架	165
8.4 数据和变量描述	168
8.5 企业隶属关系下放的决定因素	175
8.6 企业隶属关系下放的后果	185
8.7 小结	192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194
9.1 主要结论	194
9.2 经济转轨中政府分权体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动	196
9.3 未来研究的展望	199
参考文献	202



第 1 章



导 论

1.1

研究背景

从 1978 年开始，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转轨的改革已经进行了 30 余年。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 9.9% 的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使数以亿计的人口从温饱线以下逐步走向小康生活。这些事实说明，以市场化为方向的经济转轨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经济转轨作为一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体制改革，是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以至政治体制的变革（樊纲等，2003），或者说是一系列大规模的、断裂性的制度变迁（North，1990）。

诺斯很早就洞察到，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North，1973）。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为设计的约束、规范人类自身互动行为的机制”，决定了经济中各个行为主体面临的激励，只有

良好的制度才能激励人们进行投资和交易，社会资源才能配置到最有效率的用途上。近年来，大量基于跨国宏观数据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作用（Knack 和 Keefer, 1995; Mauro, 1995; Hall 和 Jones, 1999; Acemoglu 等, 2001, 2002, 2005）。如果从宏观层面良好的制度推动了 GDP 的增长，那么在微观层面，良好的制度必然影响了企业行为并使企业绩效得以改善。

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总体全要素生产率（aggregate TFP）的差异（Caselli, 2005; Hall 和 Jones, 1999; Klenow 和 Rodriguez-Clare, 1997）。而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技术进步带来的内部微观生产率的提高，这来自企业研发投入、技术引进、分工深化、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则是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即生产要素由生产率低的企业流向生产率高的企业，包括生产率低的企业不断退出市场和生产率高的企业不断进入市场这一“创造性毁灭”过程（Schumpeter, 1934）。如果存在制度摩擦导致资源无法由生产率低的企业配置到生产率高的企业，就会带来资源误置（misallocation）问题，从而降低全社会的总体生产率。因此，从微观层面看，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来自制度提高了企业内部的微观生产率以及优化了投入要素在企业间的配置。

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也是由微观企业绩效的提高和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改善所构成的，由市场化转型所带来的制度变迁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方面，产权改革中大量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过程会带来企业效率的改进，市场化改革通过改善企业的激励机制，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升级、分工深化和内部资源配置，从而促进了企业微观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推动了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减少了资源误置现象。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组、各个行业进入

管制的放松，众多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开始涌现并蓬勃发展，这一过程中生产要素逐步流向生产率更高的企业，从而提高了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并推动了经济增长。

在经济转轨期间，除本身的市场化转型外，一些独特的制度安排也对企业绩效和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式分权体制之下，地方政府间展开了为经济增长而努力的“标尺竞争”，这激励了地方政府发起制度改革、维护市场化（Qian 等，1999），为招商引资而提供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公共品。Xu（2011）将地方分权归结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性的制度安排。在正式制度外，社会资本等非正式制度也对企业 and 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处于制度转型期的中国，正式制度仍然有很多不完美的因素，但非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

1.2 研究主题

本书主要基于企业视角的理论推演和实证研究，考察市场化转型中的制度变迁过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揭示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微观机制。本书还关注了中国在转轨期具有的非正式制度和独特的政府分权体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且揭示了经济转轨期间政府分权体制、正式制度变迁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机制。具体而言，本书的研究包括如下内容：

1. 市场化转型对经济增长和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市场化转型这一制度变迁过程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有多大？由于经济转轨是一系列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要度量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首先需要全面、系统、客观地衡量经济转轨的各个方面。本书使用国民经济研究所（NERI）编制的各省区市场化进程